

■边走边唱

# 谁“谋杀”了中国教育?



◎丁栋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博士后

中国一直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历史上如此,现实中更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在其他国有企业一片紧缩的背景下,同样作为国有企业的中国教育产业却一枝独秀,蓬勃发展。中国社会民众的福利保障(如医疗)一直悬置,农民与工薪阶层因此几近绝望,但与此同时,政府却连续以成百、上千亿元的财政投资于中国的教育产业;同时中国的教育产业也以学费、杂费等各种形式从受教者及其家庭攫取了巨额的资费。还有什么其他的产业比教育产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更受到尊重么?恐怕没有了。当下中国,无论相关不相关、无论需不需要,一窝蜂地追求高学历教育包括博士教育,现在几乎成为了全民运动;就家庭来讲,无数父母含辛茹苦,就是去挣儿女的教育费用,甚至放弃自己的工作与生活而为孩子陪读,贫困的家庭经常要砸锅卖铁、甚至卖血筹钱。

经济学是讲成本效益分析的,在巨大成本投入的同时,中国教育产业的产出呢?中国教育产业的主要贡献似乎都是属于“身份的改变”。身份制是中国制度变革滞后、制度现代化不足的结果,通过教育去转变身份实乃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但这个悲剧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教育的正戏,典型的案例就是历史中的“范进中举”。而更可悲的,21世纪的中国,还在延续这个正戏。这是悲剧的悲剧。

教育的本质在于科学教育与能力培养。中国教育实现科学教育与能力培养了吗?对中国学生的实证考察的结果是:独立思考能力弱、思路容易混乱、没有掌握研究方法、缺乏扎实的科研态度。所以,致使中国人的科学研究尽管投入多(财政、精力与时间),但产出少。有人统计,在2000到2002年这三四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这六所大学及

最强的学校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总共发表了27篇论文,仅及哈佛大学的6%,剑桥大学的15%,东京大学的20%。考虑到这六所大学的规模(师生人数)都至少在哈佛大学的两倍以上,因此可以说,一所哈佛大学的科学产出相当于大约200所中国一流大学(12+6%=200)。这就是中国学术界与世界一流的差距。

另外,根据发表论文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论文引用率)来衡量,2002年中国的物理学在世界上82个国家中居第66位,与新加坡、白俄罗斯、古巴不相上下。但如果按平均引用次数来计算,它的排名却落后第675位。不仅在中国,在印度等国家,中国学生的工作能力也受到质疑。2005年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说:对于企业中层以上的管理岗位的能力,印度学生超过中国学生(这种能力差距的背后是印度教育与中国教育在财政上的反比例;印度高校学费46年没有增加,很多高校教授依靠自己的工资收入甚至不能应付生活而需要外出兼职)。由于教育不适应就业市场,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2006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比2005年增加了22%。这种就业的压力除了现有企业招聘需求不足的基本原因以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的创业积极性弱、创业能力差。

无论政府、无论个人、无论家庭,全都是在重视教育,为什么恰恰在结果层面大相径庭,甚至与开始的主观愿望二律背反了呢?

问题是尼采式的,答案也是尼采式的。谁谋杀了中国教育?是我们自己!或者说,是我们自己错误的观念与方法!尽管我们的主观本意(愿望)是好的。

错误的观点就是对于政府认知的错误。套用里根总统常说的一句话:“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国际比较研究,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以,致使中国人的科学研究尽管投入多(财政、精力与时间),但产出少。有人统计,在2000到2002年这三四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这六所大学及

■边上人语

## 节能,还需政府补救之手



◎胡飞雪

职业投资人 自由撰稿人  
现居河南平顶山市

“十一五”规划建议中,中央政府提出了一增一减两个具体而明确的指标: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应该说,与发达国家的产值能耗相比,增100%和降20%这两个指标仍然是保守而不相匹配的。但即使如此,新近的统计数字依旧不能令人乐观,按规划,200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应当比去年下降4%,但2006年上半年却同比上升了30.8%。

现实中单位产值能耗不降反升,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以寻求解决之道,在以下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不能做了规划、定了指标就算完事,政府还应拿出钱来。中国的节能空间是巨大的,也不乏更能节约的新能源产品。比如河北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及其应用系统就是很好的节能新品。相对于传统的单晶硅电池,多晶硅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更高,而成本更低,在光伏发电(利用太阳能电池将太阳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产业中潜力巨大。从1999年开始,世界光伏产品以32%的年均增长率高速发展,居世界能源发电市场增长率的首位。天威英利



没有观念与方法的改变,理想之花可能结出荆棘之果

其教育机关一手操办。中国高校没有创新性,培养不出创新性的人才,国办与国营的垄断是第一制约原因。

错误的方法就是对于学习方法认知的错误。对于中国,科学是舶来品,基于科学的现代教育也是一种舶来品。由于对科学理念与本质把握的缺失,教育者尤其是管理者本身并不真正理解现代教育的核心在智慧增进、方法培养与能力提升,如南怀瑾先生所指出的:教育现在变成了知识的贩卖场所。自古以来,从教育者到受教者,从学校、个人到家庭,中国教育都贯穿着一个知识传输的理念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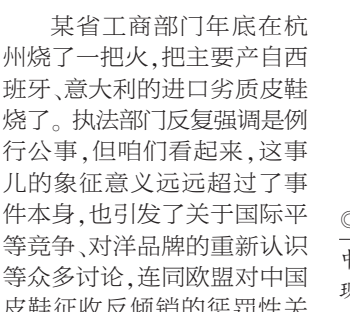
知识传输的理念结构首先倡导一种复制式的思维培养,在思考问题时以过去遇到的相似问题为基础,沿用固定的思路和惯常的思考方式去分析。复制性思维的这种特点在于遇到问题时,思考不能多样化,轻过程重结果。注重思维定势,进入一个死胡同,在一棵树上吊死。因为有经验奠基,故我们对这种方法的可靠性坚信不移,形成定势,也不愿探索其他更佳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常易导致思想僵化。

知识传输的理念结构还忽视了实践教育的重要性。美国与以色列,孩子从小就被教导以理财的理念与投资的技巧,国外的教育几乎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学生利用假期参与企业实践的活动(其间享受工资,在加拿大,政府资助工资的60%),并以此作为升学与就业的重要依据,而中国的教育几乎是学校封闭式的教育。现在,创业管理教育已经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的主流,如哈佛大学一句话:“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国际比较研究,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以,致使中国人的科学研究尽管投入多(财政、精力与时间),但产出少。有人统计,在2000到2002年这三四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这六所大学及

没有观念与方法的改变,理想之花可能结出荆棘之果。”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对于身处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胡适在20世纪初的这句感叹依然洪钟在耳。

■杂俎

## 学习秋菊 去国际打官司



◎张晓晖  
中银国际证券金融分析师  
现居天津

现在不同了,既然加入了WTO,国际上那么多的国际组织,国内有那么多的有关部门,为啥不好好说理呢?按照国际商法或者惯例去申请仲裁,不行就打官司,来个旷日持久,顺便让国内的企业上课,学习秋菊同志锲而不舍地“要一个说法”的精神,几回官司打下来,国际上的事儿就全弄明白了,就不当法盲了,不吃哑巴亏了,当个懂法守法用法维权的中国商人,学会有理有利有节的博弈手段。多好的机会呀,既理性又不烧人,还免了空气污染,可惜错过了。

回想起来,此前还烧过三次鞋:第一次是1987年,在杭州武林门广场,愤怒的杭州百姓将5000多双劣质温州鞋一把火点了,全国人民一下子知道了温州的“星期鞋”(能穿一星期算您运气)。所有温州人,连带着“温州造”,都抬不起头来。顺便说一下,那次点火的是老百姓,杭州的。

12年后,1999年,温州制鞋大户把假冒温州名牌的劣质鞋一把火点了。当时,“温州造”已经完成了形象重塑,又能叫响了,扬眉吐气地烧假

■披沙简金

## 走在与员工结盟的阳光大道上



◎王育琨

管理专家  
首钢发展研究院企业所所长

公司在快速成长过程中遭到毁灭性打击,更多的时候来自内部,来自一线员工与精英人物的造反。沃尔玛历史上也经历过快速成长的危机。那是20世纪60至70年代。沃尔玛连陷诉讼,多是一些工人不满相关待遇所致。虽然当时山姆胜了诉讼,却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安慰。

山姆·沃尔顿一开始就立下了“为客户节约每一个铜板”的店规,节约无孔不入。零售业最大的费用就是员工的工资,不从这里入手控制成本,就没有商业生存的根本。可是,守住了商人本色,却忽视了员工的基本福利。当老板把节俭的苦役横加到自己头上,通常会获得认同与好感。可是,当把俭朴无休止地施加到雇员身上的时候,就是吝啬了。因为老板以今天的苦役,可以享受明天加倍的创业成果;而一般雇员却与此无缘。面对沃尔玛员工的低工资招致的许多不满和批评,山姆·沃尔顿一时束手无策。一次顿悟改变了这一切。

1971年,沃尔顿夫妇去观赏温布尔登网球赛。一家商店的招牌吸引了他们的眼球。那是J·M·刘易斯合伙公司,它的招牌上列有全体员工的姓名,

那次点火的主要是制鞋商,温州的。

第三次是2004年,在西班牙某城,数百不明身份的人袭击中国鞋城,烧毁了一辆载有温州鞋集装箱的卡车和一个温州鞋商的仓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00万元人民币。这是一次严重的侵犯华商权益的暴力事件,主角是数百“不明身份”的人。

还听说过砸车的,外国车有毛病,商家不肯退货,于是客户把车当众砸了,虽说大闹有理,但车是人家,愿意砸了也是人家的事儿。

这次不一样了,烧鞋的是行政部门,不是老百姓,也不是商人,面对劣质商品,严肃处理无疑是必要的,但一把火烧了,总还是失之简单,没把道理说透,没把板子打在该挨打的屁股上,没把问题变成国际博弈的一部分,倒有几分莽撞。

要是咱们在饭馆吃饭,菜里吃出苍蝇了,谁都知道,把服务员、领班叫来,或者干脆找经理,把苍蝇给他看,然后让他拿出个说法,看看咱是不是满意,或者奉送一个菜,或者买单时打折,甚至买单。对吧?咱不能一生气把菜盘子摔了,那样,苍蝇找不到了,咱上哪儿说理去?

人多要随俗,入世就要明法,有话好好说,有事儿既要有理有利有节,又要不依不饶,归根结底要尊崇理性与国际规则,别把有理的事儿办得没理了。入世了,还是学学秋菊吧!

香港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中心和深圳作为副中心的作用,奠定了深港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路径选择。根据商务部的统计,CEPA实施三年来,赴港澳“一日游”已达1227万人,为香港带来600多亿港元收入,共提供了2.9万个新增职位;深圳和香港作为“CPC”通道的经济中心和重要城市,其流量经济的特征更加明显:从2004年1月至2006年5月,深圳口岸共进口CEPA项下受惠货物1.69亿美元,关税优惠达1.19亿元人民币,均占广东口岸的40%以上。

PECO计划由广东省委、省政府倡议,目前正在顺利推进中。其范围包括了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内地九省(区)的区域面积约为全国的五分之一,人口的三分之一,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广东与周边八省,人口达4.5亿,占全国的34.76%,经济总量巨大,再加上港澳庞大的统计数字,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CAFTA使得中国与东盟、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成为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10年东盟和中国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形成,一个拥有近20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总值的世界人口最多的市场,一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将出现在世界东方。

“C-P-C”通道经济显然优越于以往经常论述的“华南经济圈”这种未经制度性安排的非正式的、本质上属于一种自然经济区的经济合作方式。以深圳与东盟10国的经济合作关系为例,由于地理位置、人情风俗等方面的接近性,深圳企业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把眼光盯住东盟国家。除直接出口外,深圳企业还在东盟国家设立了各种办事处、销售处,大力开拓当地市场。

目前,东盟企业为深圳第四大出口市场。深圳企业在东盟的资产达到50多亿美元,机构30个;而东盟在深圳投资企业已经近400家,累计投资项目达到600多个,协议投资金额超过13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超过8亿美元。东盟“早期收获”优惠协议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后,深圳口岸已经成为东盟水果的主要进口口岸,占全国进口东盟水果总货值的70%。深圳已经成为我国对东盟经济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头堡城市。

当港澳、深圳与珠三角地区成为“C-P-C”通道中一个新的地理空间的中央节点时,作为一个重新组合、辐射内外的大型城市群和国家代表队,其经济总量、经济能量已成当代中国的第一经济增长极,港澳深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扩张、金融辐射与物流布局、商品吞吐与技术输出,不仅能够寻遍新的市场与新的商机,而且又一次赢得了更为广泛的要素配置效应和巨大的空间扩散效应。

■转型深圳

## “C-P-C”通道的中央节点



◎魏达志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今天,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PECO(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CAFTA(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三大具有战略意义高度的政策体系,已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崭新格局并成为类似通道般连接的南北经济大动脉,被学术界称之为“C-P-C”通道经济。

学者伍贻康早在十年前就论证说:“在当代国际战略格局中,北美、欧洲、东亚战略三大角的框架和均衡态势已露端倪。……在美、欧、亚战略三大角关系中,东亚这一力量还不明确,还不稳定,还不强有力,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将必然影响到21世纪世界多极化格局的主体和基础的构造和稳固。”

因此,“C-P-C”通道经济体现了更为深刻的宏观背景和战略叠加效应。通道经济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流量经济,流量经济包括在区域和城市流动的各种生产要素,如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等,这种不断流动的经济支撑了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高速发展。并且,这些资源和要素的流动性越强,规模性越大,开放性越好,协调性越强,那么产生的经济效益将越好,倍数效应的越高。

CEPA的出台,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中心和深圳作为副中心的作用,奠定了深港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路径选择。根据商务部的统计,CEPA实施三年来,赴港澳“一日游”已达1227万人,为香港带来600多亿港元收入,共提供了2.9万个新增职位;深圳和香港作为“CPC”通道的经济中心和重要城市,其流量经济的特征更加明显:从2004年1月至2006年5月,深圳口岸共进口CEPA项下受惠货物1.69亿美元,关税优惠达1.19亿元人民币,均占广东口岸的40%以上。

PECO计划由广东省委、省政府倡议,目前正在顺利推进中。其范围包括了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内地九省(区)的区域面积约为全国的五分之一,人口的三分之一,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广东与周边八省,人口达4.5亿,占全国的34.76%,经济总量巨大,再加上港澳庞大的统计数字,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CAFTA使得中国与东盟、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成为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10年东盟和中国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形成,一个拥有近20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总值的世界人口最多的市场,一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将出现在世界东方。

“C-P-C”通道经济显然优越于以往经常论述的“华南经济圈”这种未经制度性安排的非正式的、本质上属于一种自然经济区的经济合作方式。以深圳与东盟10国的经济合作关系为例,由于地理位置、人情风俗等方面的接近性,深圳企业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把眼光盯住东盟国家。除直接出口外,深圳企业还在东盟国家设立了各种办事处、销售处,大力开拓当地市场。

目前,东盟企业为深圳第四大出口市场。深圳企业在东盟的资产达到50多亿美元,机构30个;而东盟在深圳投资企业已经近400家,累计投资项目达到600多个,协议投资金额超过13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超过8亿美元。东盟“早期收获”优惠协议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后,深圳口岸已经成为东盟水果的主要进口口岸,占全国进口东盟水果总货值的70%。深圳已经成为我国对东盟经济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头堡城市。

当港澳、深圳与珠三角地区成为“C-P-C”通道中一个新的地理空间的中央节点时,作为一个重新组合、辐射内外的大型城市群和国家代表队,其经济总量、经济能量已成当代中国的第一经济增长极,港澳深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扩张、金融辐射与物流布局、商品吞吐与技术输出,不仅能够寻遍新的市场与新的商机,而且又一次赢得了更为广泛的要素配置效应和巨大的空间扩散效应。